

二十一世紀評論

中大一甲子

中大「前史」：記1963年之前 崇基學院的人和事

梁元生

香港中文大學創立於1963年，2023年剛滿一甲子。校內今年舉辦多種活動，紀念創校六十周年。在這以前，校內三所成員書院也先後舉行了創校周年慶典，新亞書院成立於1949年，將迎來七十四周年，崇基學院創校於1951年，邁向七十二周年，而聯合書院在1956年創辦，將踏入六十七周年。三院皆在中大建校之前成立，把其獨特的歷史也帶進中大，成為中大傳統的一部分；三院的歷史也自然成為中大的「前史」。《二十一世紀》今期以「中大一甲子」為主題，重溫創校的時代和社會背景以及首任校長李卓敏的事迹，也邀請了對中大歷史較為熟悉的「中大人」談談中大創立早期的一些人和事。由於我和崇基有着深厚淵源，因此也獲邀稿。我也借此機會，談談中大「前史」中的崇基。

一 戰亂流離，神州易幟：崇基創立的背景

中大創立時的三所成員書院開辦時有兩個共同的背景。一是1940、50年代的中國，國共相爭，內戰連年，最後是1949年中共建國，國民黨退守台灣。在香港，那時有大量難民湧入，其中包括不少的文化人和學識之士，這些流亡文化人在港期間發生許多事，記載在龍應台的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書中：有成功的勵志故事，也有落泊飄零的悲慘片段。在1950年代的香港，這些流亡學者和文化人積極地尋求教學及其他的工作機會，以求餬口養家。香港在這時期也建立了很多教育及文化機構，目的是吸納和接濟這批流亡人口中的人才。與此同時，本地的中學畢業生也因為內地大學的關閉和改組而面

臨不能回國升學的問題。崇基、新亞、聯合書院都在此時期相繼成立，目的就是為流亡學生和本地中學畢業生（特別是中文中學畢業生）解決他們的出路問題。崇基首任院長李應林回憶創校經過：「香港何明華會督，美國長老會華連牧師，馬鑑教授，香港基督教聞人歐偉國先生等，都認為在香港應趕快有一個學校，本着過去基督教人士在內地辦學的精神，繼續依照基督教教義來作育這一班青年，使他們能有機會得到深造成材，將來好得替社會服務……」這就是崇基誕生的緣起。崇基初辦的第一年，僅得學生六十三人，租借聖保羅書院課室及聖約翰大禮拜堂副堂上課，其後學生增加，便租用港島堅道147號以及鐵崗聖公會霍約瑟紀念堂作為校舍。

二 創校先賢：1950年代的崇基領導

崇基於1951年10月開學，但辦學之計劃早於前一年提出；校名定為「崇基學院」，意即「崇奉基督」，並且在何明華會督（Rt. Rev. Bishop Ronald O. Hall）領導下組成了一個籌備委員會，討論學院開辦的細節。這個委員會的多位代表後來都成為崇基首屆校董會成員，包括美國長老會駐港辦事處主任華連（E. E. Walline）博士、美國循道會駐港辦事處主任安迪生（S. R. Anderson）博士、前上海聖約翰大學校董會主席歐偉國先生、前廣州嶺南大學校長李應林博士、聖約翰大禮拜堂座堂主任羅士牧師（Very Rev. Dean A. P. Rose）等。開辦時的校董會成員如下：歐偉國為主席，李應林為秘書，華連為司庫，常務委員包括：何明華會督、羅士牧師、馬田牧師（Rev. Canon E. W. L. Martin，聖士提反書院校長）、英純真女士（K. D. Cherry，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校長）、葛賓（G. A. Goodban，拔萃男書院校長）、史伊尹（E. G. Stewart，聖保羅書院校長）、安迪生博士、馬鑑教授（香港大學退休教授）、胡素貞博士（聖保羅女書院退休校長）、羅怡基女士（B. M. Kotewall，聖保羅女書院校長）、周默真女士（香港大學女生宿舍舍監）、張榮舉夫人張陳儀貞女士（協恩中學校長）、舒活牧師（Rev. Frank Short，倫敦基督教會代表），以及顧克牧師（Rev. C. V. Cook，英國循道會駐港代表）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三位先驅者：歐偉國、何明華、李應林，他們都有豐富的辦學經驗。

（一）首屆校董會主席：歐偉國

歐偉國（1898-1959）代表着港滬的基督教商人家族。歐偉國祖籍廣東中山，歐家早年到澳洲謀生，1898年歐偉國生於悉尼。父親歐彬是上海先施百貨公司的總經理，母親譚惠然是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（1924年創立）的董事長，也是教育家和積極的社會活動份子。歐偉國最先就讀於香港聖保羅書院，其後於聖士提反書院升讀中學。二十歲隨父去上海，考入聖約翰大學，畢業後

於1918年回港，擔任香港先施公司秘書，1921年升任先施公司倫敦分公司司理，期間考察英國商業與財政。1925年返滬，出任上海先施公司的首席秘書，同時加入母校聖約翰大學校董會，並且負責帶領該校的足球隊。

歐偉國以校友身份積極參與聖約翰大學的各項活動，並且在1949年被選為校董會主席。然而，其後大陸政權更迭，教會大學面臨關閉或改組，歐氏遂離開上海，回到香港，參與策劃籌建崇基之事。1951年崇基在香港成立，歐氏被任命為首屆校董會主席。他同時是香港共濟會會長，認識的權貴很多，包括政府、軍警和法律人員，對崇基辦學和籌款有一定的幫助。

(二) 宗教代表與政府橋樑：何明華會督

何明華會督(1895-1975)，1895年出生於英國紐卡素，愛爾蘭裔，牛津大學畢業，1921年按立為聖公會牧師，翌年到北京參加世界基督教學生聯盟(WSCF)會議，是他接觸中國社會文化之始。1920年代在中國發生的「非基運動」和上海「五卅慘案」都帶給他很大的衝擊和反思，使他更加關注中國文化及社會問題。1932年，何明華被聖公會冊封為香港及華南區主教。由於他的思想開放、關心社會，尤其關注弱勢社群，為民發聲，支持改革，故有「紅色主教」之名。在英國人管治香港期間，聖公會被視為「國教」，香港的主教也具有很大的權力和影響。何明華會督是香港許多聖公會學校的創辦人和校監，他對崇基的支持，包括早期借用聖公會學校和教堂作為崇基課室，之後又出面向政府申請校園撥地和在馬料水設立新的火車站，以方便崇基師生的交通往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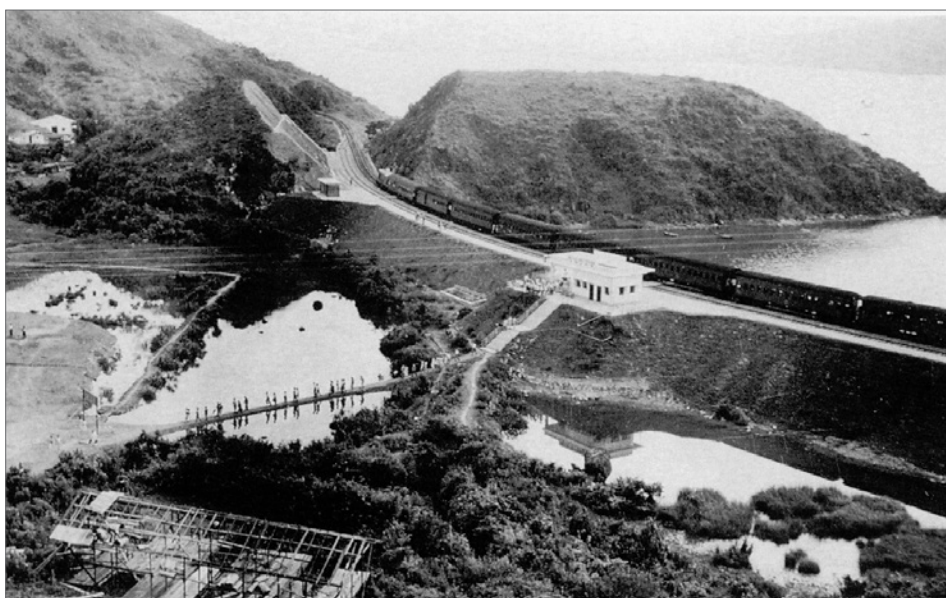
(三) 首任院長：李應林

李應林(1892-1954)，別號笑庵，廣東南海人。父早喪，家清貧，賴長兄李植三撫養長大。他曾在澳門就讀於陳子褒書館，後入廣州嶺南學堂為工讀生，1913至1914年間擔任該校青年會會長。1914年畢業後入廣州基督教青年會工作，任學生部助理幹事。1917年，李氏得青年會之助，赴美留學四年，獲得奧柏林學院(Oberlin College)文學士學位，就讀期間曾被推為該校學生青年會候選會長。歸國後，李氏仍在廣州青年會供職，任學生部主任幹事，兼社會服務部工作，後再兼任青年會中學校長。1925年升為青年會副總幹事。次年，代梁小初出任青年會總幹事。1927年，獲嶺南大學聘任為副校長。1930年，李氏請假再度赴美，到哥倫比亞大學進修；翌年返國，仍任青年會總幹事。1931年，轉任上海平民福利事業委員會總幹事，辦理興建平民新村的工作。1936年返回廣州，任青年會總幹事兼聖三一中學校長。1937年，嶺大校董會聘李氏擔任校長一職。1939年，李氏第三次赴美，接受母校奧柏林學院授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。1946年，李氏在孫科屬意及香雅各(James

M. Henry) 支持下，兼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廣東分署副署長(後升任署長)。1948年，李氏辭去嶺大校長的職務。離開嶺大後，出任青年會全國協會華南區幹事，1949年又兼任廣州青年會會長一職。1951年李氏由澳門遷居香港，參加崇基的籌組工作，獲得基督教會各方面的支援，又得到紐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(UBCCC)的經濟援助，故學院之開辦相當順利，並擔任首任院長(1951-1954)。可惜李氏擔任院長只有短短三年，即因病辭世。由歐偉國暫代院務，至翌年第二任院長凌道揚上任為止。

三 凌道揚與馬料水校園的開拓

凌道揚(1888-1993)是崇基第二任院長(1955-1960)，也是開拓馬料水校園的最大功臣。最初中大以崇基校園為基礎，再向政府申請撥地擴建，包括本部及新亞和聯合兩所書院。現在的中大佔地137公頃，依山而建，氣勢磅礴，樓舍林立，是一所風景優美而且設備齊全的大學。凌氏出身深圳望族，1955年到任崇基院長時已經六十七歲，在此以前，他有相當高的學歷和各種工作經驗，經歷並不平凡。凌氏生於一個基督教家庭，父親是巴色會牧師，凌氏自幼在教會學校讀書，亦曾遠赴檀香山做童工。回國後入讀上海聖約翰大學，1909年獲文學士學位，之後赴美留學，於麻省農學院(今麻省大學)攻讀兩年，得農學士學位，再到耶魯大學農林學院深造，1914年獲林學碩士學位。回國後曾在南京金陵大學擔任農林科教授，著有《森林學大意》、《森林要覽》，又參與制訂《森林法》，並幫助孫中山先生撰寫《建國方略》有關實業計劃的部分章節。1924年凌氏出任山東濟南林業局專員及青島大學兼任教授。離



在凌道揚院長任內，最重要的成就是開拓馬料水校園。(圖片來源：中大像素)

開青島後，先後擔任北平大學農學院及中央大學農學院院長。1931年任國民政府實業部中央模範林區管理局局長。1945年出任廣東省政府顧問、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廣東分署署長，翌年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顧問。1947年任聯合國糧食救濟總署廣東分署署長，並獲聯合國糧食農業總署邀請到美國訪問考察和任職，1948年退休，到香港新界粉嶺定居。

凌道揚是農林學專家，而且行政經驗豐富，與政府、教會及聯合國都有緊密聯繫，接任崇基第二任院長時，深得眾望。在他任內，最重要的成就是開拓馬料水校園。最初香港政府撥地10英畝予崇基興建新校園，在凌院長監督之下，校址由港島正式遷入馬料水。凌院長一方面向政府申請植林、綠化環境，擴大校園；另一方面向馬料水原居民購買更多農田，增加土地。到1963年併入中大之時，崇基校園已由原來的10英畝擴大到逾70多英畝（其後範圍增至300英畝），為中大後來的發展打下穩固的基礎。

四 加入中大之前的崇基老師

崇基開辦的頭十年，經歷兩次大轉變。一是由中環鬧市搬遷到新界村郊馬料水，另一是李應林院長離世、凌道揚接任院長。雖然環境和人事都有變動，但創校的基督教精神和繼承國內教會大學教育的初心仍然存在。那時的教會大學，主要是以美國的文理學院（Liberal Arts College）為範式，強調學生的全人教育，當然包括宗教和道德教育課程。崇基初期也是如此，無論是文



凌道揚院長（右）於1955年秋陪同信義會晏世柏牧師（左，Rev. P. P. Anspach）視察新校址。（圖片來源：《崇基十年》〔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，出版年份不詳〕，頁11。）

科或理科學生，宗教課程（人生哲學）是四年必修的，到1960年代初，剛到崇基履新的沈宣仁博士把「人生哲學」改稱為「綜合基本課程」（Integrated Basic Studies），保留四年必修的規定，即一般所說的崇基通識課。

作為一所基督教背景的文理學院，早期社會上對崇基的印象是理優於文。理學院的化學系、物理系、生物系和數學系，都能夠吸引到成績優秀的中學畢業生，特別是來自中文中學如培正、金文泰和聖保羅男女中學（前身為聖保羅女書院）中文部的優異生。初期的文學院除了語言和文史哲各科，也包括社會科學和經濟、會計等商學課程。1950年代出任過文學院院長和署理校長的麥健增教授就是經濟學家。麥健增（1900-1977）系出名門，是康有為的外孫，麥仲華、康同薇之子，1900年生於香港，入讀小學和中學，之後北上清華大學升學，畢業後考取庚子賠款設立的清華留美獎學金，到哈佛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，又在哥倫比亞大學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。回國後曾任教於清華及上海交通大學，其後回到廣州任廣東財政局局長、廣州市財政廳廳長。後來獲聘為嶺大經濟系教授。當嶺大校長李應林到香港籌建崇基時，力邀麥健增幫忙，故此麥教授亦成為崇基的籌備委員，是創校元老之一，曾任經濟及工商管理學系教授、系主任。其子麥繼強是生物化學教授，曾任教於中大新亞書院。

另外一位崇基元老是曾任職過國民政府高官的童冠賢老師。童冠賢（1894-1981），原名童啟顏，1894年生於河北張家口。早年考入南開大學，期間組織新中國學會，1916年畢業，隨即考取公費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，組織留日南開同學會，出任幹事長；和高仁山以及1918年抵達東京的馬洗凡都是學會的領導人物。在南開和早稻田留學期間，他與周恩來結識。周恩來旅日日記中曾多次提及與童冠賢的來往。在早稻田取得法學士學位後，童氏又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，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。之後又到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及德國柏林大學研究政治和經濟學。1925年，童氏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，兼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華北分會委員。抗戰勝利後，曾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平津分署署長，負責分發物資，救濟災民。童氏早年加入國民黨，1947年當選為國民政府的立法委員，翌年當選為第二屆立法院院長。1949年國民黨在內戰中失利，播遷台灣。他也在10月辭去立法院院長職務，退居港澳。1950年居於香港，1956年任教於崇基，獲聘任為經濟及工商管理學系教授，至1965年退休，後定居於加拿大。

我在1968年進入崇基歷史地理系（史地系），過了兩年，史地分家，就成了歷史系。那時中大採取的是聯邦制，三院幾乎是行政獨立的，聘請教員和收生亦各自進行。崇基歷史系的常規老師中，教世界史的有范挪亞（Noah E. Fehl）教授，講師有黃福鑾、黃道章和羅球慶，助教有潘鎮求。還有一兩位西人教師，都是短期的教員，是福特基金會（Ford Foundation）或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（UBCHEA）派來的。後來加入歷史系的老师有張德昌、李歐梵、王曾才和許冠三，都是1970年代的事了。1963年之前大概只有范挪亞、

黃福鑾和黃道章幾位。范挪亞兼管通識課程中的人生哲學和宗教課，夫人是學院的財務主管。我和兩位黃師皆有往來，而以黃師福鑾較為親切。

黃福鑾(1915-1985)，香港中學畢業後，到廣州中山大學修讀歷史，獲文學學士及碩士學位。1943年後在廣東省立文理學院教學。旋以日本侵華，多次逃難，最後回到香港，在崇基擔任史地系講師，其後擔任歷史系系主任多年，1972年退休。他在香港創辦現代教育研究社，編撰各種中學教科書，著有《中國歷史》、《華僑與辛亥革命》，以及編撰「四史索引」(《史記索引》、《漢書索引》、《後漢書索引》、《三國志索引》)等。我在崇基四年，蒙黃師照拂甚多。每年農曆新年，班上同學都會到他家拜年，班上數個同學也都參與了「四史索引」編纂的工作。

黃道章(生卒年不詳)，1949年畢業於嶺大，後赴美國南加州大學深造，取得博士學位。1960年代在崇基史地系當過系主任。他的專長是中西交通史，也教授西洋文化史和歐洲文藝復興歷史。他主要用英文寫作，多篇論文刊登在早期的《崇基學報》中，包括香港首位總督砵甸乍(Henry Pottinger)的研究，可以說是香港史研究的先驅之一。離開崇基之後，在加州州立大學教書。

早期崇基的歷史學講師中，還有一位傳奇人物，可惜我無緣結識，只是聽過不少關於他的故事。他就是程綏楚(1916-1997)，又名程靖宇，但為人熟悉的是他的筆名「今聖嘆」。程氏在崇基開辦時已經加入教師陣容，所以有報導說他有份創辦崇基。程氏是湖南人，抗戰時期肄業於西南聯大之北大史學系，授業於陳寅恪和陳衡哲門下，亦頗得校長胡適器重。1948年，程氏南下香港，1951年即加入崇基任歷史學講師，工餘兼職寫作，以今聖嘆之名在多份報章勤寫副刊和專欄，內容天南地北，文學歷史、名人軼事，皆成為其筆下題材，頗受讀者歡迎。這些文章收錄在其《儒林清話》書中，2021年該書換了書名再版，題為《新文學家回想錄》，封面有金耀基校長的題字。程氏特立獨行，和其他基督徒同事性格很不一樣，他時常出入舞場，並嗜煙酒。四十七歲時娶了一位才十九歲的日本太太，生了一個兒子，就是程鼎一，崇基英文系畢業，後來成了國泰航空的高層人員，現在是香港旅遊發展局的總幹事。

早期崇基以文采和才情知名的，還有中國語文學系(中文系)的三位才子，分別是伍俶、鍾應梅和王韶生。他們都擅寫古文和舊詩詞，也擅書畫。其中伍俶被當時譽為詩壇祭酒。伍俶(1897-1966)，字叔儻，浙江瑞安(溫州)人，是大儒黃侃的高足，與新亞的潘重規、台灣師範大學的林尹是同門。人如其名，風流倜儻，特立獨行，以詩文傳，著有《暮遠樓自選詩》詩集。1956年來港，任崇基中文系講師，開課講授《文心雕龍》及魏晉詩風。到崇基之前，他曾經在北大、中央大學、台灣大學及東京大學任教。他的詩詞和學問深受同行稱道，是中文系系主任鍾應梅最為佩服的同事。

鍾應梅(1906-1985)，號藥園，廣東梅縣人。1923年畢業於梅縣東山中學，後入廈門大學，1930年獲文學士學位，1931年任教於廣州中山大學，後

歷任廣東省立勸勤大學講師，中山大學副教授、教授。1949年來港，1953年加入崇基中文系為講師，曾任系主任，開課講授唐宋詩詞和子部專著。1971年崇基建校二十周年時，鍾教授寫了一首四言古詩，為學院祝壽。詩曰：

崇山維高。大海維深。
巍巍上庠。青青子衿。
明德弗違。永矣福音。

言樹嘉木。維桃與李。
春光爛兮。桃李穠矣。
回首廿年。樂之無已。

崇山為基。至善爰止。
大海之容。會通萬里。
祝以百年。人文蔚起。

中文系的另一位才子、詩人是王韶生(1904-1998)，字懷冰，廣東豐順人。青年時考入廣東高等師範學校(廣東大學)文史部，1926年畢業後，進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深造，又考取北大研究所國學門，隨名師學經史、詩文。北大畢業後歸里，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教員，翌年赴新加坡，任端蒙學校校長。嗣後，歷任中山大學、嶺大、廣州大學等校教授。1948年來港先任教於



崇基學院全體教職員留影，1961年2月。前排：(右二起)伍俶、童冠賢、鍾應梅、麥健增、葉意賢、謝昭杰、啟真道(Leslie G. Kilborn)、容啟東、曾昭森、韓詩梅(Bertha Hensman)、姓名不詳、黃福鑾、范挪亞(Noah E. Fehl)、德樂爾(Sara B. Downer)、張雄謀、麥國珍夫人；二排：盧寶堯(右二)、楊銳聰(右七)、王韶生(右八)、鄧健飛(右十)、(右十二至十五)凌子鑾、邵鏡人、蘇道榮、梁蘄善、李希文(左五)、范愛珍(Ethel J. Fehl)、左二)、黃壽林(左一)；最後排：劉雲章(左一)、江獻珠(左三)。(圖片來源：陳方正主編：《與中大一同成長：香港中文大學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圖史，1949-1997》(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，2000)，頁22-23。)

廣大、廣僑等專上書院，1955年起受聘崇基，至1971年退休，其後仍任教珠海書院，並在浸會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兼課，直到1989年八十六歲才再度榮休。1998年以九十五歲高齡在港離世。王教授治學精勤，著述豐碩，詩文尤為同儕及學生稱道。在崇基教學期間，其詩文常見於《崇基校刊》之中。崇基慶祝五十周年校慶時，由中文系教授蔣英豪主編《綠水青山盡是詩：崇基的詩·詩的崇基》，收錄舊時「崇基人」包括伍叔、鍾應梅和王韶生的詩作，而以王詩的數量最多。

說到1963年前的崇基老師，不能不提的還有丘鎮英和曾昭森。他倆大概都是凌道揚任院長期間加入崇基的。凌院長是客家人，丘鎮英和曾昭森也是客家人。當時崇基老師之中有不少客家人，甚至有人戲言他們是凌院長的「客家幫」。除中文系的鍾應梅外，還有刁作謙、鍾魯齋等高層人員，皆為客籍。

丘鎮英(1912-1963)，廣東焦嶺人，1935年畢業於廈門大學，主修經濟。翌年赴早稻田大學深造，專修經濟及西洋哲學。抗戰爆發後回國，1946年任職於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廣東分署。1949年舉家南下，遷居香港。先在香江書院任教，1955年加入崇基，講授經濟、地理、中國哲學史及西洋哲學史等科目。據其子丘成桐憶述，崇基校門牌樓兩旁的石楹柱刻有對聯：上聯是「崇高惟博愛本天地立心無間東西溝通學術」，下聯是「基礎在育才當海山勝境有懷抱與陶鑄人群」，雖題為凌道揚撰，實出於其父手筆。丘鎮英及其妻子梁若琳皆來自蕉嶺梅縣的書香世家，有深厚的文化素養。他們的兩個兒子丘成桐和丘成棟，都是舉世知名的傑出數學家，因受家庭教養薰陶而皆不忘傳統文化，故丘成桐對中國古典文學特別偏愛，也擅詩文章句。

曾昭森(1900-1970)，早歲生活於廣州，小學、中學和大學都讀嶺南，是個徹頭徹尾的「嶺南人」。嶺大畢業後到美國留學，在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師範學院讀博士，師從康茨(George Counts)，但最佩服杜威(John Dewey)。他的博士論文寫的是「民族主義教育與二十世紀中國」，1933年畢業後回國，仍在嶺大服務。抗戰時期嶺大遷往香港，借用港大地方上課。1941年，曾昭森在港成立進步教育出版社，並鼓勵其學生黃慶雲主編《新兒童》半月刊，成為香港兒童文學的重要先驅。抗戰勝利後，嶺大回到廣州上課，其時校長是李應林。如前所述，1948年李氏辭校長職，先到澳門，再到香港，籌辦崇基。曾昭森隨之南下，1960年任崇基代教務長之職，也在社會系開課。我讀過曾教授所寫的一本英文著作《白虎通評議》，翻譯了東漢朝廷在白虎觀內群臣一連串的辯論，並加以注疏和評析。此書充分表達了曾教授的古代政治知識，也看出他深厚的學術根底和純熟的英文運用，使我十分佩服。

另外一位教育家，也是「客家幫」的一員，就是曾經在1952至1956年擔任崇基中文系系主任的鍾魯齋教授。鍾魯齋(1899-1960)出身廣東梅縣，在家鄉就讀小學、中學，之後到上海滬江大學修讀教育。其後留校修讀碩士課程，1928年負笈美國，在史丹福大學進修，兩年後獲教育博士學位。鍾教授畢業



學生時代的梁元生教授(右二)，攝於1968年。(圖片由梁元生提供)

後一心要為家鄉改進教育及建立一所大學，他曾在1938年創辦南華學院並任院長，為教育事業奔走。但隨着時代鉅變，辦學面臨許多困難，只能留在香港發展。1949年後定居香港，任南華中學校長，繼而加入崇基，任中文系系主任，著有比較教育書籍多種，如《教學之科學研究法》、《比較教育》、《德國教育》等。

最後，我想談談我所認識的早期崇基外籍老師。和我較為熟悉的是歷史系的范挪亞(1917-?)教授。他和夫人都是後來中大的高層人員。中大在還沒有跟隨美國大學制度之前，採用的是英國制。每個科系只有一位教授，其他都是講師或高級講師。以中大歷史系而言，中國史方面只得一位教授，就是新亞的牟潤孫；世界史方面，唯一的教授就是范挪亞。他是美國猶太裔人，本科就讀巴克內爾學院(Bucknell College)，碩士和博士學位都是在芝加哥大學取得的。他在崇基的辦公室甚為寬敞，書籍甚多。房間有一張大書桌，他居中而坐，鼻樑上好像永遠架着一副太陽鏡；旁邊還有助理的桌子和座位。他的教學範圍是世界歷史與西方文化，也參加了早期崇基的通識課程設計，特別是西方文化史的部分。1960年代，他的研究興趣已經轉向中西比較史方面。我和他見面的第一天，他就把一本關於中西古代禮儀比較的書送我，可惜我一直未有認真地閱讀。回想起來，對這位老教授不無歉意。

另外一位外籍老師是芮陶菴(Andrew T. Roy, 1903-2004)博士。他1903年生於美國德克薩斯州，青少年時期住在賓夕凡尼亞州的匹茲堡，於華盛頓和李爾大學(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)化學系畢業，然後遠赴英國，在牛津大學深造，認識了歌露芝費特(Margaret Crutchfield)並結為夫婦。畢業後，芮氏夫婦被美國長老會差派到中國當傳教士，在北京、成都及南京做學生福

音工作多年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他們回到美國，芮氏繼續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，獲得博士學位。1950年代由美國長老會海外差傳部委派到香港加入崇基，繼龐德明牧師後擔任崇基校牧(1955-1960)，又在神學組和社會系開課。1960年代他應容啟東校長之邀擔任副校長，頗得學生愛戴。少為人知的卻是芮氏的學術研究。他教授政治學，也教基督教神學，但他發表在《崇基學報》的數篇英文論文都是關於傳統中國儒學的，主要是分析清朝中葉至五四時期傳統儒學的特徵及其轉變。我因為對近代儒學的命運甚為關心，曾就此一課題約芮博士訪談，其後我申請到美國大學深造時，他也為我寫了推薦信。芮博士有兩個兒子，長子芮效衛(David T. Roy)是漢學家，在芝加哥大學教書，專研中國傳統小說，包括《金瓶梅》和《肉蒲團》；次子芮效儉(J. Stapleton Roy)是外交家，曾經出任美國駐華大使。

還要一提的是一位1960年代初任崇基化學系講師、1965至1967年任學院財務長的艾詩伯(John Espy, 1922-2006)博士。他是美國人，學的是化學，是個虔誠的教徒，帶着傳教士的心志來到早期的崇基，教書的薪水都奉獻給教會，自己生活樸素，對待學生則無微不至。後來他回美國，在哈佛深造，得商學博士學位，然後回來香港，於1970年起任教於嶺南商科研究所(後稱「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」)，翌年任副所長，1977年協助中大創辦三年制工商管理兼讀碩士課程。除了教學以外，他每天都很忙碌，從馬料水跑到中環，與許多大行和洋行接觸，為的是替行將畢業的學生找工作和做推介。這種關愛態度和教育精神，也就是崇基長久以來強調的基督教自由教育的精神。在1950年代的崇基，我看到不少傳教士出身的外國老師和基督徒教師，不求自己的名利和享受，盡心盡力去與人分享和教育學生。芮陶菴和艾詩伯只是其中的兩個例子而已。

五 小結

1963年中大宣告正式成立，從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請來李卓敏博士擔任大學校長，作中央規劃，但三院合併初期實行聯邦制，三院分別在不同地方獨立運作，聘請教師和招收學生都是各自為政。正因如此，三院所建立的傳統和特色，都能夠在中大延續下去，如新亞書院對中國文化的重視，聯合書院講求實際應用和對本港社會有實際效益，而崇基學院繼承國內十三間基督教大學的傳統，在這所新成立的公立大學中守住一片基督教的園圃，如教堂、神學等。因為有初期的聯邦制，這些書院特色就都保存下來，造成今日中大百川匯海、相容並蓄的文化。

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前院長，中大校友(72崇基歷史/74研究院歷史)。